

城市化经济与城市规模的实证分析

——以珠三角城市为例

黄 林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管理系, 广东广州 510660)

摘要: 城市范围内行业之间的聚集产生了城市化经济, 这种集聚经济形态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性, 但这种关系与两者异质化有关。一般认为, 大中城市与城市化经济的关系显著, 而中小城市不显著。基于现有研究基础, 拟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 2006 年至 2010 年的工业经济和城市成长的面板数据, 揭示城市化经济对城市稳定增长的巨大作用, 并指出其对当地未来城市群经济推进的可能意义。

关键词: 城市化经济; 城市群; 报酬递增; 知识溢出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 (2013) 19-0232-06

Empirical Analysis on City Economy and City Scale

—Taking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HUANG Lin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Huaruan Software Colleg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0, China)

Abstract: Th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within the city has produced city economy. This kind of assemble economy and city scale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heterogeneity related. Generally,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hav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urbanization economy, while small and medium cities have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urbanization economy.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foundation, the industrial economy and city growth panel data of Guangzhou, Shenzhen, Dongguan, Foshan City from 2006 to 2010 are analyzed to reveal the tremendous role which the city economy plays in stabilizing city development, and point out the potent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ity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city economy; city group; increasing returns; knowledge spillover

1 前言

城市化经济亦称都市经济, 是指城市范围内的行业之间集聚经济, 当单个厂商或行业的平均成本随着城市总产出的增加而下降时就出现了城市化经济。这一过程实质就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新经济地理学把这一过程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厂商层面的内部规模经济, 即厂商随着自身规模的扩大, 其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而出现的规模经济; 二是地方化经济, 即地方经济的“马赛克”, 其重要特征是同行企业集中而出现资源共享和大量熟练劳动力, 从而降低了单个厂商产品的平均成本而产生规模经济; 三是城市化经济, 城市内的知识溢出、基础设施等共享引致的城市内各行各业单个厂商的规模经济。

改革开放后,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表现相当强劲, 如当地的非农业人口密度激增、城市化进程急剧和投资规模扩大等; 与此同时, 城市化经济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城市中往往出现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并存的局面, 甚至有些城市中后者占据了优势, 这种经济形态对城市化进程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近年来,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因要素成本增加和城市拥堵等原因, 当地许多城市的行业间集聚的厂商产品平均成本日渐提高, 甚至部分集聚逐渐向规模不经济演变, 城市化经济对城市的推进作用也将削弱, 既是为缓解东中西部差距, 也是为缓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发展与集聚经济的冲突。学界有一种主张认为, 中西部地区应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升级, 其前提是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前几年,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就是沿着这一道路

收稿日期: 2013-01-07, 修回日期: 2013-04-01

项目来源: 广州市社科规划项目“城市群与产业集聚——基于广州为中心珠三角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2012GJ03)

行进的,这一举措的实施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压力,但东部沿海地区城市膨胀及产业升级压力现象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缓解。换个角度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呈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外部的驱动力得以解决,这点学界和东部地区相关部门早已注意到了,以致推进产业集群和发展城市群经济成为本地区“十二五”的重要课题。

基于产业集聚巨大的功能,深化产业集群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其依赖的路径可能就是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经济的稳定增长会进一步促进城市朝着稳健方向发展,城市化经济越强劲的城市,在城市优化组合中越可能发展成为中心城市。本文不对城市群经济作具体的评判,而是根据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经济的实况,从数量上阐明两者的关系和未来的价值倾向。

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经济形成发展中,资本、劳动和城市经济基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规模报酬递增成为其向产业聚集和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经济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经济发展越早、越快及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城市化经济越具有优势。本文就沿着这一思路,结合报酬递增理论,为简化篇幅,仅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为视角探索城市群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密切相关的基础性问题。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述前期的研究理论和作品,第三部分构建相关分析模型和数据整理,第四部分展开综合性分析,第五部分提出总结性结论。

2 文献综述

城市化经济是城市范围内跨行业之间的聚集经济,常被学界用来解释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与尺度。在这点上,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同时学界在这方面的实证分析也不少。

在 Marshall 的外部性基础上,胡佛把规模经济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公司内部规模经济;二是单个区位上单个产业的所有公司的地方化经济;三是单个区位上所有产业的所有公司的城市化经济。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引用这三类规模经济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规模,其中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可用来解释城镇如何发展成为大的工业城市,如: Mill 和 Hamilton 把城市的形成解释为地方经济与通勤成本、城市化经济与交通之间均衡累积的过程; Yang 提出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冲突是城市产生的根本原因。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业专业化利于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但未能很好解释

城市常集中在一定区域以及城市群现象;其次是他们所阐述的城市化经济都为单个城市内经济活动主体所获得的外部性,基本未考虑城市间的交易。

Jacobs 首先在《城市的经济》中指出,最重要的外部性来源于企业所属产业的外部性,众多企业在一个城市的共存比单个产业的集中更能给城市带来活力,亦即产业的多样化比专业化更利于城市的发展^[1]。自克鲁格曼把“报酬递增”的概念引入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分析框架中后^[2],学者们分别又从动态和静态方面系统分析了城市与其内部经济报酬递增的关系,其中关于城市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研究比较系统化,如: Glaeser 等考察了两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提出多样化会促进就业增长,专业化则会减少就业^[3]; Fujita 等提出城市的聚集力来自企业规模经济导致的报酬递增,分散力是空间距离导致的商品的运输成本^[4]; Henderson 通过从地方分离的外部性,发现城市多样化是城市化经济的结果^[5]; Duranton 和 Puga 研究发现,法国在 1993—1996 年间,83.7% 的新工厂产生于多样化的城市里,多数工厂的重新定位都是从多样化城市到专业化城市^[6]。这些观点捍卫了城市化经济更利于城市的发展,但它们的立足点基本仍是单个城市内的产业集聚范畴。

关于城市化经济的实证性分析,早期的研究试图证明城市规模与生产效率的正相关关系,如: Shefer 发现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可以带来生产效率提高 14%~27%; Sverikauskas 进一步实证确定这一比率是 6%~7%^[7]; Ciccone 和 Hall 首次采用城市就业密度作为聚集经济的度量,发现这一比率是 6% 左右,这一结论激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其中多数分析发现经济活动密度对城市经济的作用显著的 (Glaeser 和 Mare; Ciccone; Ottaviano 和 Pinelli)。也有学者以城市的就业人数 (非农业人口) 代表城市化经济估计了地区制造业的劳动效率,结果发现只有产业中存在城市化经济,如 Capello 基于意大利米兰一组高科技企业样本,通过生产函数对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化经济的作用并不重要^[8]。

关于中国城市与城市化经济的研究相对少,多数学者用省级制造业面板或截面数据进行城市群经济的研究,而且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如: 张昕和李廉水以国内 34 个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为样本,分析了集聚经济对城市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化经济的作用远小于地方化经济^[9]; 傅十和与洪俊杰以 2004 年我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不同规模企业在不同规模城市得益于何种集聚经济,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和城市人口规模后,各类规模企业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很少^[10]; 刘修岩利用中国 2003—2006

年城市面板数据,通过城市相对多样化、专业化对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内生问题,结果显示,城市相对多样化对非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1]。

关于城市化经济与城市规模有了重要进展,基本认同城市化经济(多样化)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作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但已有的研究有以下几点不足:(1)城市化经济的概念并未完全统一,结果导致研究的结论存在出入;(2)孤立分析单一城市,忽视了城市间的交流;(3)分析的假定条件不同及内生性问题的排除,导致可能得出不同结论;(4)对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的分工分析尚待展开。

3 实证模型及数据说明

3.1 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城市相对专业化、相对多样化指数及C-D基本生产函数来解释城市化经济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模型的推导过程如下。

C-D基本生产函数为:

$$Y_{ijt} = A_{ijt} L_{ijt}^{\alpha} K_{ijt}^{\beta} \quad (1)$$

式(1)中, i 为某个产业; j 为某个城市; t 为时间; Y 为总产出; L 为劳动力数量; K 为资本; A 为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技术、制度和要素组合等对生产的影响; α 为劳动弹性; β 为资本弹性。

根据Duranton和Puga提出的模型,城市相对专业化指数(RZL_{ij})和相对多样化指数(RDI_{ij})的计算公式为:

$$RZL_{ij} = \frac{S_{ij}}{S_i} \quad (2)$$

$$RDI_{ij} = \frac{1}{\sum |S_{ij} - S_i|} \quad (3)$$

式(2)和式(3)中, S_{ij} 为 j 城市 i 产业的经济指标所占的比例, S_i 为 i 产业的经济指标在全国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相对专业化指数实质为 j 城市各产业区位熵最大者;相对多样化指数则为 j 城市各产业比重与全国相应产业比重差的绝对值之和的倒数。

把式(1)滞后一期,综合式(2)和式(3),求对数可以导出总产出增长模型:

$$\ln \frac{Y_{ijt}}{Y_{ij(t-1)}} = \ln \frac{A_{ijt}}{A_{ij(t-1)}} + \alpha \ln \frac{L_{ijt}}{L_{ij(t-1)}} + \beta \ln \frac{K_{ijt}}{K_{ij(t-1)}} \quad (4)$$

对式(1)中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假定全要素生产率 A 包含产业分工程度与经济初始水平的制约因素,且专业化和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累积性,亦即前期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影响后期的经济增长,参照索洛的残差模型建立如下

城市发展模型:

$$\ln \frac{Y_{ijt}}{Y_{ij(t-1)}} = \alpha_0 \ln \frac{L_{ijt}}{L_{ij(t-1)}} + \alpha_1 \ln \frac{K_{ijt}}{K_{ij(t-1)}} + \alpha_2 RZL_{ij(t-1)} + \alpha_3 RDI_{ij(t-1)} + \alpha_4 G_{ij(t-1)} + \varepsilon \quad (5)$$

式(5)中, $t =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t-1)$ 作为基期年(取值2005); $G_{ij(t-1)}$ 表示 j 城市 $(t-1)$ 年总产出; L 和 K 分别代表 j 城市的从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 ε 代表残差项; α_i 表示待估系数,代表各因素的个体效应。

对式(5)进行估计前,先通过 F 统计量检验 α_i ,发现个体效应是存在的;然后通过Hausman设定检验来选择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并通过共线性检验式(5)解释城市发展的合理性。另外,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下文必要做出解释。

3.2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个地级城市2006—2011年的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1)和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调查报告(2006—2011)。上述四个城市涵盖各自城市的城区管辖面积,其中:广州市剔除增城市、从化市和各区农村区域,深圳市、东莞市、佛山市也根据实际情况剔除农村区域;四个城市涵盖的常住人口数达3千余万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整理),模型中的劳动用非农业劳动从业人员计算。

由于以上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如深圳外来人口数占本地区总人口数达82%,人口流动性较大,这一结果是当地收入高环比的使然,而这恰恰也暗含着本文计量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选用劳动数据时以常住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口数据为准,并把市级区域的范围锁定在城区范围;但因东莞、深圳、佛山的众多城镇与城区的城市群关系,这些区域的城镇也列入了统计范畴。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2002版(GB/T4754-2002),本文选取一门类B-S两位代码行业13-98,一门类行业主要包括: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产业,金融业、住宿餐饮业、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19个行业。资本投入则用资本存量替代,其中排除四个城市中剔除部分的资本存量数据。

3.3 数据统计的描述

四个城市中,非农业常住人口从业人员相对数(基期年为2005年)如表1所示。表1反映了广州市的非农业常住就业人口相对数基本保持一个上升态势,从2006年到2009年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较小,

而 2010 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当年大量流动人口流入广州及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就业。深圳、东莞的非农业常住就业人口也呈上升趋势,其中东莞非农业常住就业人员所占的比例较大。而佛山的非农业常住人口所占的比例较小,一个重要原因是自 2003 年起该市取消了农业人口统计。

表 1 广州等四城市非农业常住就业人口相对数 (2006—2010)

城市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广州市	1.021	1.052	1.032	1.061	1.112
深圳市	1.023	1.042	1.060	1.078	1.146
佛山市	1.011	1.021	1.026	1.034	1.132
东莞市	1.024	1.045	1.083	1.107	1.253

注:以 2005 年的非农业常住就业人口为基数比较而得

表 2 反映了各市的资本投入量逐年呈现递增趋势,其中佛山和东莞两市的投入增长速度最快。自 2009 年后,四个城市的资本投入都呈现很高的增长比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2008 年后的经济出现暂时的萧条,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财政投入。

表 2 广州等四城市资本投入相对数 (2006—2010)

城市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广州市	0.1167	0.0984	0.1300	0.2232	0.2270
深圳市	0.078	0.056	0.091	0.1646	0.1378
佛山市	0.2020	0.1980	0.1550	0.1680	0.1690
东莞市	0.1811	0.1924	0.1122	0.1586	0.1782

注:表中结果是各期的增长速度

广州 2006—2010 年非农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18.46%、17.45%、16.13%、10.24% 和 17.99%;佛山 2006—2010 年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23.56%、23.03%、19.65%、10.36% 和 17.37%;深圳 2006—2010 年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17.51%、17.02%、14.45%、5.26% 和

16.8%;东莞 2006—2010 年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20.96%、20.34%、17.17%、1.64% 和 12.43%。以上数据反映了四城市除农业外总产出高的增长率,其中佛山增长速度最快,这点与广佛同城的打造相关;2009 年非农业总产出增长率各城市出现明显下降,主要是当年的出口贸易减少及新劳动法实施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

采用四城市相应产业的非农业常住就业人员,利用公式 (2) 和公式 (3) 可得到它们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和相对多样化指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反映四个城市的专业化水平都比较高,其中以东莞的专业化水平最高,佛山次之,深圳的专业化水平也是相当高的。而且,表中反映的产业都是两位代码行业即制造业下的三位代码行业。从相对专业化指数的时间变化看,东莞、佛山的专业化程度有加强的趋势,表明两城的区位选择对产业内部的外部性较敏感,其中的差异较小,侧面反映了专业化与城市规模也存在某种相关性;广州的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人员比例也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最高的,但由于制造业门类多,就业人数较分散,稀释了其中的专业化程度,其金融业的专业化水平相对比较高,相对专业化指数最大达 3.732。

从相对多样化指数来看,东莞、佛山的多样化程度不高,都介于 2~3 之间,表明它们对区位选择的城市化经济不敏感;广州、深圳的多样化程度较高,其中广州介于 8~9 之间,表明广州的区位选择对城市化经济较敏感,而且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相对多样化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侧面反映了城市化经济与城市规模的相关性。

表 3 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的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 (2006—2010)

城市	指标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方差
广州	相对专门化产业	金融业	金融业	金融业	金融业	金融业	—
	相对专门化指数	3.674	3.573	3.732	3.673	3.563	0.004
	相对多样化指数	7.582	7.831	8.341	8.321	9.478	0.423
深圳	相对专门化产业	计算机通信	计算机通	计算机通信	计算机通信	计算机通信	
	相对专门化指数	5.431	5.672	6.621	6.231	6.735	0.191
	相对多样化指数	5.321	5.342	5.023	4.882	4.984	0.035
佛山	相对专门化产业	电器器材	电器器材	电器器材	电器器材	电器器材	
	相对专门化指数	7.672	7.826	8.521	7.945	8.122	0.086
	相对多样化指数	2.821	2.672	2.562	2.623	2.478	0.013
东莞	相对专门化产业	纺织服装	纺织服装	纺织服装	纺织服装	纺织服装	
	相对专门化指数	8.467	8.782	8.672	8.871	8.845	0.023
	相对多样化指数	2.341	2.252	2.234	2.320	2.211	0.003

注:计算机通信、电器器材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简称

依据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分,一是多样化明显高于专业化城市,这类城市为综合性城市(如广州),对知识溢出较敏感;二是多样化与专业化大致相当的城市,是从专业化城市向综合性城

市过渡的城市(如深圳);三是表现为较高的专业与较低的多样化,并且两者呈现负向变动关系,如佛山、东莞,它们多在专业镇的“马赛克”基础上发展起来。

4 经验分析结果

上述数据显示,产业的地方经济和城市化经济都与城市规模存在相关性,地方化经济在中等城市较为敏感,城市化经济在综合(大)型城市中较为敏感,但城市规模与地方化经济及城市化经济的决定关系并没有反映。下面运用2006—2010年广州、东莞这两个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城市经济统计相关数据,利用公式(5)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4、表5所示。

表4 广州市发展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Sig.	t	共线性检验	
	B	Std. Error				Tolerance	VIF
常数	0.865	0.145		0.000	5.726		
lnL	0.458	0.057	0.421	0.000	8.345	0.212	4.717
lnK	0.678	0.052	0.645	0.000	14.672	0.201	4.762
RZI	-0.211	0.023	-0.096	0.051	-2.362	0.423	2.364
RDI	0.223	0.012	0.205	0.043	1.782	0.441	2.277
G	-1.041e-06	0.000	-0.231	0.000	-5.633	0.497	2.015

1. 拟合优度 $R^2 = 0.9541$, 总体显著性检验: $F(11, 567) = 465.25$, $Prob > F = 0.000$ 。

2. 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设定的 Hausman 检验: 卡方(20) = 283.26, $Prob > chi2 = 0.000$ 。

注: 数据来源于广州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调查总队调查报告(2006—2010)

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除专业化系数较低外,式(5)及其他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都在0.01及0.05之上,通过了检验;进行共线性检验,各项的容忍度都大于0.1,说明选择解释变量具有不可替代性,即式(5)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式(5)是可靠的,可以用来解释城市发展的因素分析。

表5 东莞市发展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Sig.	t	共线性检验	
	B	Std. Error				Tolerance	VIF
常数	0.820	0.126		0.000	5.435		
lnL	0.564	0.051	0.532	0.000	7.642	0.198	5.052
lnK	0.578	0.052	0.541	0.000	15.703	0.243	4.116
RZI	0.311	0.018	0.368	0.048	2.685	0.423	2.364
RDI	-0.263	0.015	-0.226	0.038	-2.956	0.345	2.897
G	-1.044e-07	0.000	-0.252	0.000	-4.898	0.467	2.142

1. 拟合优度 $R^2 = 0.9612$, 总体显著性检验: $F(12, 2437) = 467.25$, $Prob > F = 0.000$ 。

2. 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设定的 Hausman 检验: 卡方(20) = 283.26, $Prob > chi2 = 0.000$ 。

注: 数据来源于东莞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调查总队调查报告(2006—2010)

表5的估计结果为,除多样化系数较小外,其结果与表4的基本一致,深圳和佛山的发展模型估计结果分别与广州和东莞的发展模型估计相似,这里不再累赘。

由表4可以看出,资本、劳动是影响广州城市规模的最重要因素,其中资本的影响力更大;城市经济基础G的标准化系数为-0.231,表明城市规模

存在着收敛性;地方化经济(马歇尔外部性)在广州的标准系数为负数(-0.096),也就表明地方化经济不利于广州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化经济的标准化系数为0.205,表明城市化经济对城市规模的作用是正向推动的,一定程度上验证了Batisse的结论。

从表5可以看出,资本、劳动同样是东莞城市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同广州相比,劳动的作用更加明显;城市化经济标准化系数为-0.226,表明多样化是其规模发展的阻力因素;地方经济标准化系数为0.368,表明专业化是东莞城市规模扩大的重要因子;城市基础G的标准化系数为-0.252,表明城市规模还是呈现收敛性。

综合表4、表5及可能相关的推论,可以推定城市化经济对专业化城市(东莞、佛山)的规模扩展是不利因素,而对广州的推动力较为突出,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之间的知识溢出。

以上的多元回归仅是孤立分析了四个城市的城市化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但因其呈现收敛性,这两种外部性对城市规模扩展作用越会乏力。然而表3数据显示,地方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在影响专业化城市和多样化城市规模作用方面有加强态势,这种推动作用与城市间的互动分不开。下面简要分析四个城市之间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变动情况。

利用HHI值和四个城市2006—2010年工业两位代码行业的总产值数据,可以计算四个城市多样化(专业化)度的时间序列变化,详见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广州的HHI值小于0.1并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其多样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深圳的HHI值也逐渐趋向0.1以下,表明其多样化程度加强,正向大都市方向发展;佛山、东莞的HHI值都在0.25以上,除个别年份外,该值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东莞2010年的HHI值超过了0.4,表明其专业化程度加强相当明显;佛山的专业化程度上升趋势相对缓慢,但2010年的HHI值也接近0.4,表明其专业化程度日渐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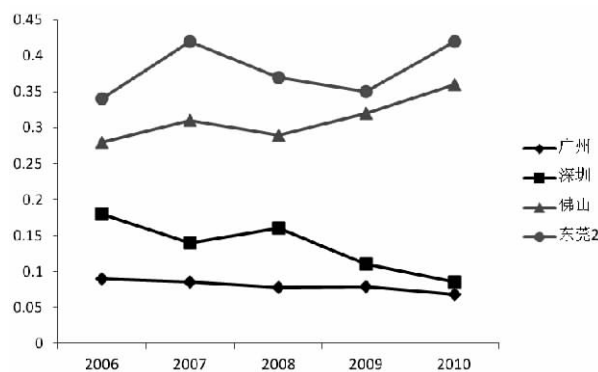


图1 广州等四城市工业专业化度变动趋势

近年来,四个城市之间的互通正在加强,尤以

广佛同城为最,四个城市的专业化(多样化)程度变化趋势正反映广州、深圳在珠三角地区中心地位强化,而佛山、东莞的专业化程度加强也反映了专业分工在中等城市加强。

5 结论

本文采用多样化指数与城市经济增长模型实证分析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这四个城市的规模与城市化经济的关系,并简要分析了四个城市之间与城市群发展的地位。经验估计发现:

首先,制造业在四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其中包含的非农业常住就业人口也是最多的。佛山、东莞的产业集聚形成机理虽有较大差异,但其产业间的同构性较明显;广州、深圳的产业集聚形成机理也呈现明显差异,由于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加强了城市化经济对城市规模的推动。

其次,城市化经济在不同城市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甚至是一个相反过程。计量显示,城市化经济有利于广州、深圳两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不利于东莞、佛山两城市的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大,而且这种作用短期内不显著。

再次,沿海城市对城市化经济的敏感度明显超过内地城市,但在特定区域内,城市化经济对城市规模的推动作用与该城市的多样化(专业化)程度有关。多样化城市与城市化经济之间相关呈正向,而专业化城市与城市化经济间的相关呈反向。

最后,城市经济基础的标准化系数为负,表明城市经济增长及规模存在收敛性。2010年,四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呈现明显,经济发展速度反超2009

年,这点表明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并没有体现出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区城市交流互动加强,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在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中,各城市应根据自身产业特征做好自身定位。

参考文献:

- [1] J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M]. New York: Vintage, 1969: 5-61
- [2] P 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3): 483-499
- [3] E GLAESER, H KALLAL, J SCHEINKMAN, et al. Growth in cities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6): 1126-1152
- [4] M FUJITA, P KRUGMAN, T MORI.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 (2): 209-251
- [5] J V HENDERSON. Externaliti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7, 42 (3): 449-470
- [6] G DURANTON, D PUGA. Nursery cities: Urban diversity, process innovation, and the life cycle of produc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1454-1457
- [7] L SVERIKAUSKAS. The productivity of citie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5 (89): 393-413
- [8] R CAPELLO. Entrepreneurship and spatial externalities: Theory and measurement [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2 (33): 541-549
- [9] 张昕, 李廉水. 我国城市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解释 [J]. 中国软科学, 2006 (9): 21
- [10] 傅十和, 洪俊杰. 企业规模、城市规模和集聚经济 [J]. 经济研究, 2008 (11): 112-123
- [11] 刘修岩. 集聚经济与劳动生产率: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 (7): 110-119

作者简介: 黄林 (1966—), 男, 江西丰城人, 高级经济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企业管理。